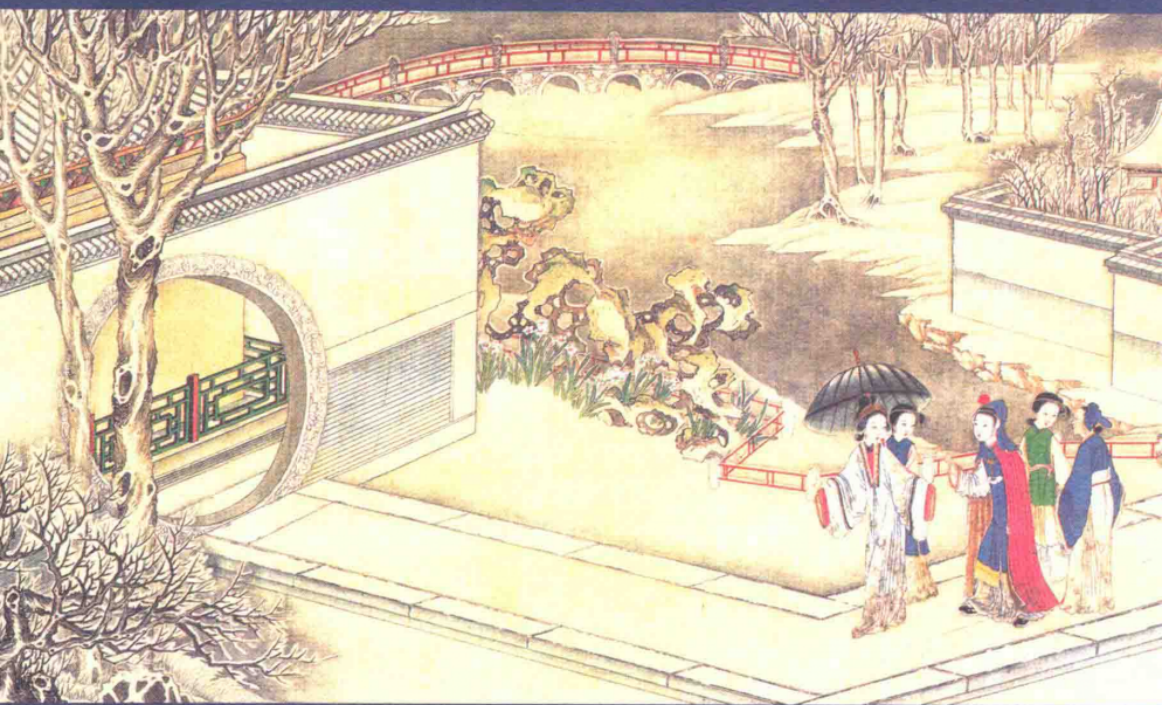


红楼新辨

欧阳健著



红楼新辨

欧阳健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新辨 / 欧阳健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9.12

ISBN 978-7-5108-8622-5

I. ①红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《红楼梦》研究 IV.
①I207.4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84794号

红楼新辨

作 者	欧阳健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	21
字 数	336 千字
版 次	2020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8622-5
定 价	5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编者说明

本书是一部红学论文集，收录作者的谈红文章，分作七个部分，涉及红学界多个论题，旨在证明脂本是后出的伪本、程甲本才是《红楼梦》真本的新说。

红学研究，是一个在既有资料中反复揣摩、论证的过程，故而篇幅的重复不可避免。若因例证重复而将重复部分删掉，会割裂整个论证过程的整体性，所以本书选择将其保留，以使论证更完整、明晰。

对于红学研究来说，争论是一种常态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争论，学术研究才有更大、更深的发展，这是学界的幸事，也是学科的幸福。

提请读者阅读时注意！

九州出版社

序

欧阳健先生的《红楼新辨》即将出版，实在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。这不仅仅因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学术著作，而且也是一部向传统成见发难的“争鸣”之作，势必将在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。故此，我衷心地祝贺它的诞生。

我与欧阳健兄是莫逆之友。我们相识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徐州《金瓶梅》学术会，次年，又在沈阳的明清小说研讨会上重逢。此后，又多次在各种有关古代小说的研讨会和编委会上见面。我对他在古代小说研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敏锐的眼光、开阔的视野、执着的追求，钦佩之至。这些年来，他的丰硕成果，反映了他的勤奋和刻苦精神。我对他的为人和治学，都是很信任的。我曾问及他，在古典小说名著中，为什么单单没有写过《红楼梦》的文章？他表示：一则此书实在博大精深，恐难穷其底蕴；二则红学界人才济济，众说纷纭，不欲再凑“热闹”。为此，我曾引以为憾。

一九九〇年夏，我主编“古代小说评介丛书”，邀他撰述《古代小说版本漫话》。迫于论题的需要，始不得不涉及《红楼梦》的版本。在他之初衷，不过拟参照综合诸家成说以成文，不意稍一涉足，即感诸说凿枘，有于理不合处，遂发愿细读原典，辨其真伪，考其流变，径得出“脂本乃后出之伪本，而程本方为《红楼梦》之真本”的结论。书稿初成，不敢自专，曾与我商议，问其风险若何？我答曰：“学问无禁区，观点无忌讳，只要持之以故，言之成理，尽可公之于众，以求学人共识。我既为丛书之主编，诚愿与之共担责任。”

其后，欧阳健兄穷两年之力，完成《红楼新辨》一书，殊为可贵，故乐为之序。

侯忠义

一九九三年六月于北京大学燕东园

目 录

一 绪言	1
二 脂本辩证	15
三 脂批辨析	75
四 脂斋辨考	143
五 “探佚”辨误	163
六 史料辨疑	193
七 结语	233
附录 脂本掺假离析录	281

|一 绪言

一、红学的出路在哪里？

“拥挤的红学世界……”

红学家曾经如此这般亦喜亦忧地形容红学研究的现状。“拥”，有“聚”的意思，《三国志·诸葛亮传》云：“今操已拥百万之众”，声势可谓大矣；“挤”，也有“聚”的意思，《红楼梦》第四十三回云：“老的，少的，上的，下的，乌压压挤了一屋子”，人口密度可谓高矣。据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于曼玲编《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索引》统计，自1904年至1992年初的近九十年中，发表的有关明清小说的论文论著共19064篇（部），就中评红之作竟达8265篇（部），占总数的43.35%。“聚”全国研究队伍近二分之一的力量于数千部明清小说中的一部，红学世界又怎能不让人感到拥挤呢？

人多，并不是坏事。问题在于，在红学这块苑地里，“因拥挤而齟齬而争吵，致使多年来红学论争从未停止过。不仅索隐、考证和小说批评红学三派之间，你攻我伐，无有尽时；同一学派内部也歧见纷呈，争论不休。迄今为止，没有哪一个红学问题不存在各种意见的分歧。而且，不争则已，一旦争论起来，便失去平静，即使不‘几挥老拳’，也是相见耿耿，不欢而终。”^①具体到版本问题上，“迄今为止，还是言人人殊，无以定论。往往一说即出，很快就遭到反驳，而反驳者自己，也不一定坚信己说。特别是版本演变和《红楼梦》成书过程的关系，现在还未能找到大家都基本认可的说法。”^②由版本派生出来的脂砚斋问题，情况还要糟糕，“脂砚何人？无论说是叔父也好，舅父也好，曹頔也好，棠村也好，曹雪芹自己也好，史湘云也好，都不过是一种猜测，而且是证据并不充分的猜测，不仅在研究者中间达不成一致，更主要的是每一种立说本身就没有实证的支持”，“从已经知道的材料看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立说，对材料作怎样的分析”，都无法作出确切的答案，竟成了“休想解开”的“死结”！^③

可是，这似乎并不妨碍红学家对七十年来“新红学”所取得的成就抱有的乐观态度：“自从二十年代初期胡适介绍脂本以来，多少读者、研究者研读《红楼梦》两种版本系统——脂本和程本，高度重视脂砚斋的批语，毫不怀疑脂本是先于程本、接近原

① 刘梦溪著. 红学 [M]. 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0：267.

② 刘梦溪著. 红学 [M]. 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0：323.

③ 刘梦溪著. 红学 [M]. 北京：文化艺术出版社，1990：334、335.

著的早期抄本”^①并取得“《红楼梦》版本最初只有抄本，它们是曹雪芹稿本的过录本，抄本一般都带有脂砚斋的评语，称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’”^②的共识。这一共识，由于被反复地讲述、宣传、运用，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或“常规认识”，成为固定的、下意识的思维习惯。它是红学研究的最高法则，是不容任何批评和挑战的；当大量存在的事实与之发生矛盾的时候，人们的怀疑总是指向事实本身，不惜去责备那些不合时宜的事实“不真实”“不典型”，而丝毫不曾虑及这种“常规认识”或者思维习惯是否科学、是否可靠，更没有想到红学的危机与紊乱，同这种公认的最高法则之间是否有着内在的联系。

红学要前进，出路在哪里？人们曾经提出过许多方案。最新的意见是：“红学要有发展和突破，特别需要红学界同仁耐得住寂寞，甘于坐冷板凳，五年十年沉下去，做艰苦的研究工作。……我们要博览群书，通读熟读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著作，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和思想理论水平。要精通史学，并向哲学、文化学、社会学、宗教学、民俗学、心理学进军，建立与红学有关的边缘学科，还要精通诗词歌赋、琴棋书画等各个艺术门类，以期打开思路，触类旁通，加深对《红楼梦》的理解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一定要有积累，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，包括校勘、考证、笺注，实地调查、挖掘资料等等，尽可能在原有基础上有更多更深的发现。”^③可是，豪言壮语无助于解开红学研究中一个个“死结”；深刻地反思新红学七十年来的路子是否走正，检讨红学研究的“原有基础”是否牢固稳当，倒确实是当前的首要任务。

某学者说：“胡适可以说是红学史上一个新‘典范’的建立者。”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，《红楼梦考证》这部“新红学”的奠基之作，经历了七十年来的风风雨雨，至今并未动摇其权威的地位，当代的红学研究，依然是在胡适开辟的掌子面上，采用胡适建立的“典范”运作的。重新梳理胡适《红楼梦》版本考证过程的逻辑顺序，重新检验他的最后结论，看看聚集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的红学事业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才是求得红学的发展和突破的真正出路。

① 陈诏.正本清源，厚积薄发[J].红楼梦学刊，1992(3).

② 应必诚.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版本系统[J].复旦学报（社会科学版），1992(1).

③ 陈诏.正本清源，厚积薄发[J].红楼梦学刊，1992(3).

二、重评胡适的《红楼梦》版本考证

胡适 1921 年着手考证《红楼梦》版本的时候，他所得到的版本，除有正书局的八十回石印本（所谓“戚本”）以外，都是以程伟元的百二十回排印本为底本的。这是胡适彼时版本考证的物质前提，也是我们把握胡适日后思维脉络的关键。

当时，胡适对于“戚本”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，他只说了一段并未引起后人深究的话：“有正书局的老板在这部书的封面上题着‘国初钞本《红楼梦》’，又在首页题着‘原本《红楼梦》’。那‘国初钞本’四个字自然是大错的。那‘原本’两字也不妥当。”^①

题“国初钞本”，为什么便是“大错”？胡适对此并未加以论证；也许他以为，既然已经“弄清”了曹雪芹的事迹家世，那么“国初”云云之“大错”，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。至于戚本为“原本”也“不妥当”的理由，胡适则说得非常清楚：“这本已有总评，有夹评，有韵文的评赞，又往往有‘题’诗，有时又将评语抄入正文（如第二回），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，决不是‘原本’了。”^②从版本学的角度看，胡适的判断，理由是充分的，有说服力的，只是我们一定不要忘了胡适这时说的话才好。

胡适考证的重点对象是两种程伟元的本子：乾隆五十六年辛亥（1791）萃文书屋活字本（胡适误记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第一次活字排印本，他称之为“程甲本”）和乾隆五十七年壬子（1792）萃文书屋活字本（胡适称之为“程乙本”）。他此时所得到的材料，主要是“程甲本”程伟元、高鹗的两篇序和“程乙本”程伟元、高鹗的七条引言。从这些材料中，胡适特别强调的是以下两点：

第一，高序中说：“予闻《红楼梦》脍炙人口者，几廿余年”；引言中说：“是书前八十回，藏书家抄录传阅，几三十年矣”，胡适据此得出结论说：“从乾隆壬子上数三十年，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（1762）。今知乾隆三十年间此书已流行，可证我上文推测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之说大概无大差错。”^③这条材料因为与自己的假设相合，故胡适深信不疑。

第二，程序中说：“然原本目录一百二十卷，今所藏只八十卷，殊非全本。……不佞以是书既有百二十卷之目，岂无全璧？爰为竭力搜罗，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，无

①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09.

②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09.

③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11.

不留心。数年以来，仅积有二十余卷。一日，偶于鼓担上得十余卷，遂重价购之，欣然翻阅，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榫，然漫漶不可收拾，乃同友人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，抄成全部，复为镌板，以公同好，《石头记》全书至是始告成矣。”高序中说：“今年春，友人程子小泉过予，以其所购全书见示，且曰：‘此仆数年铢积寸累之苦心，将付剞劂，公同好。子闲且惫矣，盍分任之？’予以是书虽稗官野史之流，然尚不谬于名教，欣然拜诺，正以波斯奴见宝为幸，遂襄斯役。”对于同是程、高所说的话，胡适却又大加怀疑起来。他不相信《红楼梦》的原目有一百二十卷，并且肯定地说：“《红楼梦》最初只有八十回，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《红楼梦》。这是无可疑的。”^①他也不相信程伟元搜罗后四十回，先得二十余卷、后又在鼓担上得十余卷的事，同样肯定地说：“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，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！”^②

胡适的怀疑是否真有根据呢？

让我们先来看看《红楼梦》最初的抄本是否只有八十回的问题。周春《阅〈红楼梦〉笔记》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自序云：“乾隆庚戌（1790）秋，杨畹耕语余云：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，一为《石头记》，八十回；一为《红楼梦》，一百二十回，微有异同，爱不释手，监临省试，必携带入闱，闱中传为佳话。时始闻《红楼梦》之名而未得见也。壬子（1792）冬，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，兹苕估新刻本来，方阅其全。”周春（1729—1815），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进士，他在乾隆五十五年庚戌（1790）听杨畹耕所言《红楼梦》有一百二十回钞本之事，当有所据。胡适到了1961年，也注意到了周春的话，并且承认“应该可信”，但却解释为“高鹗续作后四十回，合并前八十回，先钞成了百二十回的‘全部《红楼梦》’，可能在乾隆庚戌秋天已有一百二十回的钞本出卖了。到次年辛亥（乾隆五十六年，1791），才有程伟元出钱用木活字排印”^③。胡适想用从庚戌到辛亥的时间来解释一百二十回抄本之事，殊不知周春所记，乃杨畹耕转述雁隅的话，其中还提到“监临省试，必携带入闱”的事，省试即乡试，逢子、午、卯、酉年为正科，庚戌、辛亥均无科；且高鹗写于“辛亥冬至后五日”的序中明明交代：“今年春，友人程子小泉过予，以其所购全书见示”，可见胡适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。

至于程伟元说他偶于鼓担上得残卷一事，胡适以为“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”，而断言是“作伪的铁证”（直到1959年，他还说“天下这样巧的事很少，所以我猜想序

①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09.

②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15.

③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327.

文中的说法不可靠”^①，也失之武断。以《平妖传》为例，此书原本为四十回，后被书贾删为二十回，号为“罗贯中旧刻”。墨憨斋手校《新平妖传》云：“旧刻罗贯中《三遂平妖传》二十卷，原起不明，非全书也。墨憨斋主人曾于长安复购得数回，残缺难读，乃手自编纂，共四十卷，首尾成文，始称完璧。”冯梦龙发现二十回不是全书，于是留心搜罗残本，果然在长安“购得数回”（或许即在鼓担上购得亦未可知），便以此为基础，重编为《新平妖传》四十回，这情况与程伟元所说，极为相似。

胡适之所以要怀疑乃至否定程、高关于《红楼梦》有过一百二十回钞本的说法，不过是为了牵合他关于《红楼梦》原本只有八十回，“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人作的”^②的大胆假设而已。

1927年，是胡适的《红楼梦》考证，也是“新红学”发展史上顶重要的一年。“甲戌本”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的出现，使胡适的全部立论第一次获得了版本上的依据，难怪到了1961年，他还满怀深情地说：“我们现在回头检看这四十年来我们用新眼光、新方法搜集史料来做‘《红楼梦》的新研究’总成绩，我不能不承认这个脂砚斋甲戌本《石头记》是最近四十年内‘新红学’的一件划时代的新发现。”^③

胡适1928年提及甲戌本发现的经过道：“去年我从海外归来，便接着一封信，说有一部抄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愿让给我，我以为‘重评’的《石头记》大概是没有价值的，所以当时竟没有回信。不久，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，藏书的人把此书送到店里来，转交给我看。我看了一遍，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，遂出重价把此书买了。”^④胡适开初以为“重评”的《石头记》没有什么价值，这种判断源于他对戚本“有总评，有夹评，有韵文的评赞，又往往有‘题’诗”，“可见已是很晚的抄本”的旧有印象；那么，是什么原因使胡适一下子就认定这本同样有“重评”字样的本子“是海内最古的《石头记》抄本”呢？

第一，此本第一回正文有“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”十五个其他版本没有的字，胡适因此判定：“甲戌为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那时曹雪芹还没有死。”^⑤这与他以往推断《红楼梦》成书流行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（1762）的意见相合。

① 胡适著·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255.

② 胡适著·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16.

③ 胡适著·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317.

④ 胡适著·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58.

⑤ 胡适著·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61.

第二，此本第一回又有一条朱笔眉批：“壬午除夕，书未成，芹为泪尽而逝。”胡适认为，壬午年为乾隆二十七年，除夕为1763年2月12日，这与他关于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（1765）的“猜测正相符合”^①。

从这两个基点出发，胡适又判断“甲戌以前的本子没有八十回之多，也许只有二十八回，也许只有四十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甲戌以前雪芹已成八十回，那么，从甲戌到壬午，这九年之中雪芹做的是什么书？难道他没有继续此书吗？如果他续作的书是八十回以后之书，那些书稿又在何处呢？”^②这种胡适式的提问，是很古怪的。按理说，甲戌如果已经写成八十回，那么，以后九年里，完成余下的四十回是绰绰有余的；但这又同胡适后四十回为高鹗补作的结论相扞格，于是只好一口咬定甲戌本没有八十回之多。到了三十四年以后的1961年，他更进一步断定曹雪芹在乾隆甲戌年写的稿本只有十六回，并且一再强调：“凡最初的抄本《红楼梦》必定都称为‘脂砚斋重评《石头记》’。”^③他甚至还对自己以往“冒失的话”加以反省道：“我当时就没有想象到《红楼梦》的最早本子已都有总评，有夹评，又有眉评的！所以我看见‘戚本’有总评，有夹评，我就推断他已是很晚的辗转抄本，决不是‘原本’。”^④

胡适关于脂本的观点是否合乎实际呢？换句话说，有什么证据证明甲戌本是早于程本的“最早本子”呢？

从版本学的观点看，程本是乾隆辛亥（1791）、壬子（1792）的活字印本，它的问世年代，确实无疑。甲戌本是抄本，假定甲戌为乾隆十九年甲戌（1754），比程本的排印早三十七年；但此本出现于1927年，又比程本的问世晚一百三十六年。根据版本流变史的一般规律，许多小说在成书之初，多有以抄本形式流行的，《红楼梦》也是这样，程伟元序提到的“好事者每传抄一部，置庙市中，昂其值得数十金，可谓不胫而走矣”，这一事实至今无人提出过疑问。正因为《红楼梦》获得了普遍的欢迎，才促使程伟元等在乾隆辛亥年自春至冬以不到一年的时间“细加厘剔，截长补短”，用木活字排印问世。毛庆臻《一亭考古杂录》载：“京板《红楼梦》流衍江浙，每部数十金。致翻印日多，低者不及二两。”印本价值既廉，且又极为醒目，对于一般读者，自会舍抄本而取印本，抄本被逐渐淘汰，几乎是必然的。以《金瓶梅》为例，谢肇淛《〈金瓶梅〉跋》

①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93。

②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86。

③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201。

④ 胡适著，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[C]。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318。

说“此书向无镂版，抄写流传”，抄本的价格非常之昂贵，有屠本《山林经济籍》载王肯堂“以重资购抄本二帙”可证。据史料，明代藏有《金瓶梅》抄本的就有王世贞、刘承禧、王肯堂、王稚登、董其昌、袁宏道、袁中道、文在兹、丘志充、谢肇淛、沈德符等文化名人，抄本的数量，可谓夥矣，对抄本的珍惜程度，可谓甚矣。可是，当刻本问世以后，所有的抄本都统统湮灭消失了，甚至连片纸残页都未留存下来，道理很简单，既然有价廉物美的刻本，又何必去看那相形见绌的抄本呢？要判定甲戌本是早于程本的曹雪芹的真本，就应该对它的来历、题署、年代、格式、讳字等等版本在鉴定上至为紧要的关目进行必要的考证和说明；可惜，大约由于过于倾心于“新材料”之可印证自己“大胆假设”的实用性了，胡适竟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版本之学中不少不该忽略的东西：

一、抄本的来历。因为是抄本，不能不首先考查它的来历。梁启超说：“其书不问有无旧本，但今本来历不明，不可轻信。”^①胡适1928年只介绍了买得甲戌本的大致经过，而卖书人的姓名、身份，抄本的来历，都未予说明。到了1961年，当他把此本交付影印时，方在“跋”中作了一点交代：“我当时太疏忽，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住址，没有和他通信，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。”^②胡适在《红楼梦考证》中批判种种“牵强附会的《红楼梦》谜学”之后，曾经郑重提出：“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，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，著者的事迹家世，著书的时代，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，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。这些问题乃是《红楼梦》考证的正当范围。”^③按照胡适的判断，甲戌是乾隆十九年（1754），流传到1927年，应该有一百七十三年了。胡适之所以“疏忽”了他自己认定的《红楼梦》考证“正当范围”中的大事，是因为他无法对这一百七十三年的历史空白作出解释。

二、抄本的题署。胡适在1928年介绍说，此本“首页首行有撕去的一角，当是最早藏书人的图章”^④；1961年又补充说：“我在民国十六年夏天得到这部世间最古的《红楼梦》写本的时候，我就注意到首页前三行的下面撕去了一块纸：这是有意隐没这部抄本从谁家出来的踪迹，所以毁去了最后收藏人的印章。”^⑤甲戌本直到1961年才影印

① 梁启超著. 中国历史研究法 [M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.

②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338.

③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86.

④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159.

⑤ 胡适著.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 [C]. 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：338.

出版，在此之前，谁也不清楚撕去的是“一角”还是“前三行的下面”。今检影印本，第一行顶格写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”八字，第二行低一格写“凡例”二字，以下皆为空白。第三行撕去“多”字以下五字，第四行撕去“鉴”字以下两字，皆有装裱后胡适印章可辨。看来甲戌本撕去的是首页前四行的下部，且呈斜撕状。按版本惯例，卷端书名之下，一般应是撰作者或评注者的题署（当然，通俗小说也有不题撰人的），所以，被撕去的一角中，不能排除有题署的可能。胡适竭力给人一个先入的印象，仿佛那一角中只有藏书人图章一种可能，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谨严的态度（除非这一角就是胡适自己撕去的，他亲眼看到确系藏书人的印章）。况且，不论是题署，还是藏章，“有意撕去”，总是明显的事实，那么，为什么不追究一下背后的动机呢？

三、抄本的年代。鉴定抄本的年代，有多种方法，不能简单凭字面上所写的一二干支加以推定。此本第一回写空空道人将《石头记》从头至尾抄录回来以后的情形道：

……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为《情僧录》。至吴玉峰题曰《红楼梦》，东鲁孔梅溪则题曰《风月宝鉴》。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，则题曰《金陵十二钗》，并题一绝云：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

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。

出则既明，且看石上是何故事……

“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，仍用《石头记》”十五字，为今存所有《红楼梦》版本（不论是印本还是抄本）所无，因了这个“甲戌”，胡适方兴奋地宣称他得到了一个“世间最古又最珍贵的《红楼梦》写本”，一个“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”！那么，这十五个字是原来就有的、后来方被人删去的呢，还是原来并无、后来才被人增加的？细绎文意，此段文字叙述的是《红楼梦》的撰写修改过程，由空空道人至吴玉峰，至孔梅溪，至曹雪芹，层次相当清楚。其中最后一位定稿人曹雪芹所做的是：“披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纂成目录，分出章回”，于是在录完他所题诗句以后，用“出则既明”直承前文，语意连贯。而此本忽从中添加“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”一句，顿使气势中泄；且将

“抄阅再评”写入正文，完全不合情理，显然是后人所加，据此判断此本抄成于乾隆甲戌年（1754），是难以凭信的。

四、抄本的讳字。利用讳字来鉴定版本的时代和真伪，是版本学上公认的通则，胡适对此似毫不在意。此本卷一第四页“神仙玄幻之事”、第十页“此乃玄机，不可预泄者”“玄机不可预泄”，卷二第九页“悟道参玄之力”等处的“玄”字，统统没有避讳。清代避讳极严，而此本不讳“玄”字，又突然出现在清亡十六年以后的1927年，所以连是否为清人所抄都难以相信，更遑论生活在乾隆朝的曹雪芹自己的批本了。

五、抄本的格式。此本卷一第五页“诗礼簪□之族”，“簪”字后空缺一字，分明是一个“纓”字未写。类似的例子还有卷十三第六页“正□个美缺”，第八页“各诰命来□亏了礼数”，卷十四第三页“至于痰□担帚”，第四页“更衣□手”，等等。这种书写的格式，表明是一个后出的抄本，大约由于底本上的字迹漫漶或蠹蚀，抄写者空出一格以待考；类似情形，我们在《金云翘传》《风流悟》等传世抄本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过，因此也决不会是什么早期的定本或曹雪芹的稿本。

六、抄本的文字。此本多错别字，如卷一中“好货”误作“好贷”，“元宵”误作“元霄”；卷二中“龙钟”误作“聋肿”，“炼汞”误作“炼永”，“嵇康”误作“稽康”；卷三中“费用”误作“废用”，“杜撰”误作“肚撰”；卷五中“膏肓”误作“膏盲”，“池沼”误作“池沿”；卷六中“苍穹”误作“苍穷”，“钦敬”误作“欢敬”；卷十三中“掌管”误作“拿管”，“巴不得”误作“爬不得”，“钐束”误作“黔束”，等等，连甲戌本最关键的“戌”字，也误写作“戍”了。抄本又多简体字，甲戌本中，“黛玉”有时写作“代玉”，己卯本、庚辰本更大量写作“代玉”；“个”“门”“机”“劝”“刘”“边”等简体字，触目皆是。这些现象都表明，抄本绝不是什么稿本，甚至也不是接近原稿的过录本，它们只能是文化水准较低的抄手的产品。

以上六项中的任何一项，都可以对抄本早于印本的观点提出挑战，更何況六项的总和呢？

三、重新面对红学的“本”和“源”

尤其值得深思的是，胡适一面写文章宣扬他的“划时代的新发现”，宣扬“脂本是